

北京娼妓与北洋政府

张 文 钧

一、从清吟小班庆余堂说起

我父亲母亲在北京开设清吟小班庆余堂南方妓院，我姐姐香妃后来曾被选为“花国大总统”，是北京最有名的妓女。我母亲既是掌班，又兼鸨母。银行界的李六爷常对她说：“你可真会调理姑娘，明明是一个黄毛丫头，在你手里不到三个月，就成了一个能说能笑的画上美人了。”

清末民初，我父亲母亲在北京开设清吟小班庆余堂南方妓院，我姐姐香妃后来曾被选为“花国大总统”，是北京最有名的妓女。娼妓本是旧社会统治阶级的玩物，北京娼妓与北洋军阀政府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我的回忆，就从我家庆余堂说起。

我父亲张子培，苏州人。自幼学会了厨行手艺，清末在盛宣怀家里当厨子。1910年盛宣怀当上了邮传部大臣，到北京来

就任。他从上海带来了大批的人，把邮传部里的小职员、当差都换用了带来的南方人。我父亲也随他来到北京，在邮传部当厨房。有一天，我父亲偶然遇见了当时大名鼎鼎的赛金花。赛金花也是苏州人，小时候在苏州当妓女，嫁给了状元洪钧，曾随洪出过洋，和英国女皇一块照过相。洪钧死后，她又在北京当妓女，遇上庚子事变，由于她和德国统帅瓦德西有些旧交，就替瓦办理过粮台，因此得了“赛二爷”的名称。庚子以后，她仍然在北京做妓女。那时北京的南方妓女已经由城里口袋底搬到南城去了，赛金花的妓院便开在陕西巷。她遇见我父亲，非常高兴。因为当时妓院里对于请客的酒席相当重视，必须争奇斗胜，超过一般饭庄，而她正找不到一个南方厨子，便极力劝我父亲给她帮忙。我父亲正想多找收入，听赛金花一说，便高高兴兴答应了，从此吃上了妓院的饭。

这年赛金花因为打死养女，吃了官司，被押送出京了。她的妓院有个叫做梁栖的妓女接办下来，改名叫做梁栖书寓^①。梁栖的妓院本来靠她自己支撑门面，但她年长色衰，生意渐不如从前，便到上海找到了一个叫做“大阿姐”的作帮手。

大阿姐也是苏州人，自幼和赛金花住在对门。因为自己的妹妹在上海做了妓女，便也跟着在妓院里当了“大姐”^②。妹妹出嫁以后，上海当时妓女中的四大金刚——林黛玉、胡宝玉、陆兰芬、金小宝她都跟遍了。她积蓄了几个钱，嫁了人，在租界里开了一家小小的纸烟店。不料那年腊月三十晚上，邻居一家纸烟店因为买卖作亏了，自己放了一把火，骗取保险金，结

“梁栖”两个字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写法，事隔多年，也无从查问了。

^② 大姐，是鸨母雇用的，陪着妓女出堂差，应酬客人，但名义上并不是妓女，也不接客住夜。所以上海妓院中说：“妓女有价，大姐无价。”

果把大阿姐的店铺也烧在里面。她丈夫吓疯了，自己带着三男一女，生活上真是走投无路。凑巧梁栖约她帮忙，而她在几年以前曾跟着妹妹到过一次天津，北方还不是完全陌生，因此也是一说便妥。她在上海替梁栖接了两个妓女，一同到北京来。这样，大阿姐就认识了我父亲。我父亲那年已经 31 岁了，还没有结婚，而大阿姐的丈夫又已经疯了，两个人便同居了。1912 年生下了我。因此，我有三个哥哥，一个姐姐，他们都姓乔，和我同母不同父。

却说梁栖书寓自从我母亲来后，生意虽然有些起色，但是收入多了，她的开销也更大了，还是入不敷出。我父亲经常把妓院的事情托付我母亲，自己却在上海玩乐、赌钱，拉了一身债。最后一走了之，把妓院整个丢开不管了。

梁栖书寓关了门，但倚靠这个妓院生活的人男男女女也有 20 多口。大家都劝我母亲自己当老板，免得离散。我母亲这时认识了几个阔绰的客人，其中一个头号阔客邓君翔愿意拿出大批钱来做妓院的后台。而且他给这个妓院起了个与众不同的字号，叫做“庆余堂”。北京的南方妓院叫做清吟小班，一般名为书寓。邓君翔起庆余堂这个名字，是有来历的。

邓君翔也是苏州人，原名叫邓文藻，在妓院里面一般称他做邓三爷，邓当时是北京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。据说邓君翔的舅舅吴有龄（妓院里称为吴二爷）幼年时和他弟弟二人都在庆王府里当书童，陪着庆王的儿子振贝子等人一块读书。那时庆王府书房里已经学英文了。贝子们的英文没有学好，而吴有龄兄弟两个却把英语学得十分流利。振贝子出国，便带着他们弟兄两个，这样就和英国人拉上了关系。后来英国人在中国开设汇丰银行，便请吴二作北京分行买办，吴三作天津分行买办。

那时中国刚有银行，又加上吴二和庆王府的关系，生意做得十分兴隆，外国人发了大财，吴二的财也发得不小。恰好庆王受了一笔贿，有 2000 万两银子之多，存进了汇丰银行，开了个户头叫做“庆余堂”。不料风声不密，被御史蒋式惺等人联名参了一本，西太后大怒，要查账。庆王慌了手脚，找吴有龄想办法。吴有龄把庆余堂这户存款账整个抽换，2000 万两银大部吞没，对有关系的人——点缀了一些，连御史们也分润了一笔。这个大贪污案就烟消火灭了。可是吴有龄作贼心虚，惟恐西太后追究，便从苏州把在纱厂任职的外甥邓君翔找来，接充汇丰买办，自己却逃到英国躲避，直到西太后死后才敢回国。

邓君翔饮水思源，所以当他答应借一笔钱给我父母开妓院的时候，首先想到了这样一个名字——“庆余堂”。我母亲首先赞成，她说：“上海有个名妓胡宝玉，开的妓院就叫做庆余堂，一直热闹了好几十年她才洗手不干，落了个全始全终。我们今天也起这个字号，但愿也能像她一样，将来也有个收场。”

庆余堂最初开设在前门外胭脂胡同，那时韩家潭、百顺胡同还是相公堂子的下处，妓院都在陕西巷、石头胡同一带。

庆余堂开市以后，我父亲仍然亲自掌厨。他作得一手好苏州菜，又曾是盛宫保家里的大师傅，这一来就吸引了当时一些阔客。我母亲又久在上海妓院，一切排场都仿效上海几家名妓院，真是布置得富丽堂皇。当时的阔老爷们不但在妓院打牌、吸烟，消磨很长时间，还可以在这里谈他们的“公事”，无形中就成了他们的俱乐部了。

我母亲既是掌班，又兼鸨母。她从上海接来妓女还不放心，自己还兼作娘姨，出门跟条子。在家里，一间间房间都要应得嫖客们舒舒贴贴。银行界的李六爷（李律阁，名宣威）常对

她说：“你可真会调理姑娘，明明是一个黄毛丫头，在你手里不到三个月，就成了一个能说能笑的画上美人了。”

由于我父母俩人都想尽心思经营，不久庆余堂就在北京城里成为南方妓院里生意最好的一家。阔客们除了外国银行买办们外，就算清末的贵族子弟，如良三（良揆，荣禄继子）、转二（载转）伦五（溥伦）等，妓院把他们叫做“王爷崽子”。

二、袁世凯带来的“繁荣”

小凤仙所以帮助蔡锷出走，还不是出于政治眼光，不过蔡锷是她的恩客，两个人很相好，不忍他遭到袁世凯的毒手，才设计帮他逃出这个龙潭虎穴的。

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上了民国的总统，首先给北京的南方妓院——特别是庆余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“繁荣”。

由于孙菊仙等人的提倡，北京成立了梨园公会，严厉禁止相公堂子。韩家潭、百顺胡同的相公下处纷纷倒闭。南方的妓院就立即代替了相公堂子，在韩家潭、百顺胡同纷纷开设起来，庆余堂也从胭脂胡同迁到了韩家潭。这时南方妓院不再称作书寓，改名为清吟小班，以区别于二等的“茶室”和三等的“下处”。

袁世凯政府里面，从国务总理以下都成了妓院里的阔客。袁世凯本人虽然没有到妓院走走，可是他的子侄们却是庆余堂

里经常接待的主顾。我们习惯称之为“袁家门”。

袁家门的主要客人有袁大、袁二。袁二是袁世凯第二个儿子袁寒云（克文），是个有名的风流才子。他每逢到庆余堂来，总把马车停放在大外廊门口外。他年纪还轻，相貌又不错，当然是庆余堂上上下下最受欢迎的客人了。他曾在庆余堂接过雪里青，还曾在天津娶过苏黛春。他和雪里青只有六个月就散了，苏黛春在他家也呆了不到一年。袁二喜新厌旧，一个妓女接到家里，玩腻了，就随她走开了事。每人离开袁家，都带走了不少古董字画。

至于袁大，却并不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，而是他的侄子袁乃宽。不过在我幼年的印象里，袁大长得面孔溜圆，倒真跟“大头”上面刻着的袁世凯一模一样。袁大一来，前呼后拥，可以坐上半屋子人。他是给袁世凯管理财政的，所以手笔最阔绰，常从靴掖里掏出钞票来赏人，身上所带的钞票从来没有 10 块以下的。

袁大、袁二经常在庆余堂摆酒请客，而请袁大、袁二吃酒的人也就少不得要利用庆余堂。如赵秉钧、梁士诒都是当时庆余堂最熟的客人。梁士诒喜欢怡红院的少掌班怡红，后来怡红便跟他从良了。

袁家门及和袁家门有关的人在庆余堂吃酒，我父亲照例给他们特备一桌大饭碗，大小介于菜碗与饭碗之间。顶好的江西瓷，上面画着大红的花，镶着金边。大概因为这些客人以北方人居多，又在军队中多年，饭量较大，所以才准备下这套特别的饭碗吧。而邓三等银行帮来了，则另有几套细瓷小饭碗，那就小巧玲珑与大碗不同了。

民国以后，中国人自己办的银行日渐增多。除了大清银行

改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外，又先后成立了金城、盐业、大陆、中南等大大小小的银行。银行界的客人比起袁家门的就斯文多了。他们谈话细声细气，不像袁家门那伙人大吵大闹。按当时的规矩，在妓院打一场牌是 12 块到 14 块钱，银行帮却另定了章程，打一场牌赏 120 块。所以妓院最喜欢的客人就是银行帮。

我母亲每年要到上海接妓女，有一次她用 1000 块身价买回一个十七八岁的闺秀，据说是一位买办的小姐，由于家道中落自愿下水的。这姑娘姓林，花名凌云阁，读过书写得一笔好字。因此生意简直红得发紫。袁二几乎每天早晨来摆一台花酒，和我母亲、凌云阁三个人吃。邓君翔也要天天在这儿请客。中国银行的冯耿光、李律阁，交通银行的曹汝霖、时素卿、钱新之，西门子洋行的买办鲍星槎都是她座上的常客。她在庆余堂没有做到一节，却给庆余堂赚了一笔大钱，后来就嫁了直隶都督张锡銮。张锡銮过去曾在关外收抚过张作霖，是有名的快马张。他的年龄当然比凌云阁大得多，可是一定要娶她。据说凌云阁嫁他的条件之一是永远不能说出她在妓院从良，而且要同到上海见她父亲，承认是从上海把她拐出来的，当面向她父亲认错。

庆余堂还有红妓女花如玉老二，会唱小嗓，也吸引了一部分人。她有一个沈姓客人是扬州的盐商。沈的妻舅就是杨毓珣，妓院里都称他杨二虎。那时杨还年轻，正在上学，陪着他姐夫到庆余堂来，认识了花如玉。他们白天来摆一台酒，不请外客，只有花如玉陪着他们两人吃。

花如玉还有个客人，是当时挺有势力的老爷，叫做王天纵，过去是个强盗头儿。后来花如玉嫁了他，随他到外省去了。

在袁世凯时代，前门一带的妓院比起清朝来更是热闹得多了。政界、银行界的阔人天天在妓院里摆酒请客，把妓院当作

他们的交际场所。有些人甚至把妓院当作他们的办公厅，会客、谈公事都借妓院的房间，目的似乎已经不完全在于女人了。但真正为了嫖妓的，当然也不少。听说有位将军府姓蔡的将军到北京来见袁世凯，由于袁世凯和他有点世交，给了他 6000 块钱，他便在妓院里一连住了半个月，把钱花光了才去将军府就职。还有国会的议员老爷们，从各地来到北京城，纸迷金醉，把国家大事忘得一干二净，天天逛窑子、住夜。当时有个人叫做“李六更”，天天早晨到妓院一带打更，口里还唱：“天不早了，醒醒吧！”也许他是希望这些沉迷在胡同里面的老爷们赶快从“香梦”中觉醒过来吧。

当年不但袁世凯政府的老爷们在妓院里寻欢取乐，那些反对袁世凯的革命党人也常利用妓院办事，以免被人注意。清末民初，北京城里常闹刺客，连袁世凯都免不了遇过两回刺。侦缉队办案的人也常在妓院一带寻找可疑的人。有时听说也曾在哪家妓院破了哪件案子，逮了哪些人，开妓院的也免不了要吃官司。在庆余堂就曾有过这样一回事：有个姑娘叫花心心，会唱小生，唱一段射戟、叫关，大家说挺有德珺的味儿。在庆余堂虽不甚红，也是个比较出色的姑娘。她认识了一个客人，名叫唐蟒（字圭良、湖南人），我们都称他唐大爷，听说在上海也是个很有名气的人物。唐大爷认识她以后，两个人打得很热，经常捧场不说，恨不得把办公桌都搬到庆余堂里面来。我母亲因为他是南方人，相貌不俗，态度谦和，没有老爷架子，也很看重他。这一天，唐大爷正在庆余堂，忽然门口来了两个穿灰大褂的直在门前走来走去，一望而知是侦缉队里的伙计。我父亲第一个看见了，吓得变颜变色，以为是逮抽大烟的呢，悄悄告诉了我母亲，我母亲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忽然唐大爷把我

母亲找去，说：“劳驾偷偷到门口看看，有穿灰大褂的没有？”我母亲说：“不用看了，听说正有两个穿灰大褂的在门口蹲点呢。我们当家的以为是逮他抽大烟的，正吓慌了神呢！”唐大爷笑笑说：“什么抽大烟的，那是总统府派来逮我的，你能替我想点办法救救我么？”我母亲一听，心里也打起鼓来了，心想：唐大爷这么年轻的，要让侦缉队逮去，还活得了呀！花心心在旁一听也吓坏了，一口一个：“娘，给想想办法吧。”于是我母亲走出大门一看，果然有两个穿灰大褂的，在那里叭哒叭哒抽烟头呢。我母亲走上前去说：“二位，辛苦！站了大半天了，里面坐会儿，喝碗茶。门房就在门道，坐在里边，出入的人都看得见，不比在这儿喝风强么？”这两个人一听，自然就走进门房坐下来了。我母亲招呼他们烟茶，又走出大门，把唐蟒的马车夫叫到花心心屋里，向唐蟒说道：“唐大爷，您把您车夫的衣服穿上，扮成车夫，赶上马车，奔东车站上天津吧。”唐蟒一听，这倒是个办法，换了衣服，出了庆余堂，赶着马车就走了。那两个侦缉队的还在门房喝茶呢。到了夜深人散，不见姓唐的出来，也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。在此以后不久，在妓院一带又传遍了小凤仙放走蔡锷的事。

小凤仙和蔡锷的故事，据我听说，小凤仙所以帮助蔡锷出走，还不是出于政治眼光，不过蔡锷是她的恩客，两个人很相好，不忍他遭到袁世凯的毒手，才设计帮他逃出这个龙潭虎穴的。关于小凤仙，我母亲很熟悉，曾经谈过她凄惨的身世，这里顺便提两句。小凤仙湖北人，父亲是在外省做知县的。清朝末年那个县城发生变乱，她父亲自刎。她还有一个弟弟，名叫阿辛，当时都不满 10 岁。她母亲把一对儿女托给姘居的厨子和奶母后，也就悬梁自尽。厨子姓李，便和奶母带着小凤仙姐弟

来到北京。到她十四五岁时，奶妈把她下了妓院，而且成了北京城的红姑娘。最后嫁了一个姓王的东北军人。她曾为她弟弟娶了自幼订婚的弟媳。她弟弟嫖赌吸毒，弟媳被奶妈逼诱下水，不从自刎。

三、当“梨园红”的时候

当时北京开戏馆子的、唱戏的都对黎元洪特别欢迎，因为他们迷信，黎元洪谐音“梨园红”。梨园行要能够红，妓院的生意也就跟着走运。

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，不久病死，黎元洪继任总统。当时北京开戏馆子的、唱戏的都对黎元洪特别欢迎，因为他们迷信，黎元洪谐音“梨园红”。梨园行要能够红，妓院的生意也就跟着走走运。当时所谓三子——窑子、戏园子、饭馆子大多数都在南城前门外一带，形成娱乐场所集中的地区。北京有句俗话说：东富西贵，北贫南贱。南就是指南城，把三子都看成了“贱业”，而阔人老爷又都离不开这三子，所以就形成了南城的特殊繁荣。黎元洪当总统的时候，北京城里还有句俗话，叫做“湖北三杰”。三杰之中头一个当然就是黎元洪了，其二是被称为伶界大王的谭叫天，还有一个就是南方妓院北林房的妓女小阿凤。

小阿凤，湖北人，自幼被人卖入妓院。养父是在汉口开妓院的，养母叫做阿宝姐，在汉口的妓院里也是数得起来的人物。后来阿宝姐同她男人闹翻，带着 9 岁的小阿凤在北京学戏、卖

唱。过了两年小阿凤上了捐，作清倌人，渐渐就红起来。当时捧小阿凤的阔人很多，王克敏也是其中之一。有一天王克敏在六国饭店把小阿凤叫去，掏出一把手枪来，硬逼着小阿凤嫁给他，不然他就要自杀。经过阿宝姐讲条件，王克敏一口出了6000块，于是小阿凤就嫁给了王克敏，这时她才15岁。

阿宝姐到手6000块现大洋，加上她素日的积蓄，手里也有三四万块钱。这时就又有北洋政府里一个大官、当过北方议和总代表的王揖唐硬要娶她。阿宝姐当然高高兴兴答应了，以后就成了王揖唐的部下和亲友们所尊称的“如夫人”。

南方妓院里还有一个红妓女苏佩秋，她原是山东人，苏州话却说得十分流利，神态举止也和南方妓女一般无二。苏佩秋当时也是一个顶红的妓女，后来嫁给曹汝霖，十分得宠。当年，她忽然想要给自己死去的父母安葬，但埋葬的地方没有碑碣，年深日久，辨认不出。她倚仗着曹汝霖的势力，把那一带多少个坟头都挖了出来，寻找她父母的骨骸。开棺动木，在封建社会是了不起的大事，而苏佩秋这样蛮干，大家因为惧怕曹汝霖的势力，也只好敢怒而不敢言了。

当时另一个有名的大官李思浩，在庆余堂里也看中了一个妓女花云仙，花却死活不肯嫁给他。后来托辞南返，连李要买她的铜床作为纪念都不肯答应。最后还是我母亲另外介绍一个新上捐的小玲珑给他，花了3000块接走了。

这时在北京政府里最有权势的，要属徐树铮了。因为大权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里，而段却什么事都听徐树铮的。大家都在背后说，徐树铮是站着的段祺瑞。徐树铮也喜欢逛妓院，首先在庆余堂看中了苏芸仙老四。苏芸仙原有两个要好的客人，李律阁和邓君翔他们二人是朋友，相约轮流在苏处住夜。苏的

生意好起来，由她生母另开栖凤院。苏芸仙房间的家具大部分是邓君翔出钱买的，窗帘、铜床则是李律阁买的，都是在临记洋行买的进口货。可是她却只玩弄这两位银行阔人，而另外爱上一位姓梁的穷学生。她居然使出手段让邓、李援引那学生在交际场中出入。不料后来发现姓梁的原来是个小偷。以后苏芸仙还是嫁给了徐树铮。徐树铮把苏芸仙娶进北池子的公馆以后，十分宠爱。徐树铮的公馆很大，而房间的陈设却很简陋，床上铺的被褥还是老粗布的。苏芸仙替徐大事铺张，换上了临记洋行的西式家具、苏绣锦缎的被褥……。徐树铮喜欢哼昆腔，每天“鸡”呀“鹅”地曲不离口，他是江北人，字音并不正确。苏芸仙是苏州人，又会唱京剧，倒给他纠正了不少的音韵。徐树铮有间书房，每逢他要考虑什么事情，就自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任何人非经他呼唤不能随便进去，只有苏芸仙可以自由出入。但她的自由范围却不能走出徐公馆一步。徐的家庭人口很多，规矩很严，不许随便出门，苏芸仙的娘家人一概不许登门。

这时前清的一般王爷少爷们，虽然还常在妓院里跑，但不像往年那样可以随便挥霍了。庆余堂有位阔客黄稼寿，却专和王爷少爷们往还。黄稼寿是个日本留学生，自称大商人，在汉口接了一个妓女从良，名叫花彩贞。他来到北京，在东城遂安伯胡同买了一所很宽绰讲究的公馆（这个地方在敌伪时期曾经开过日本妓院），布置得十分华丽。他常陪同王爷少爷们在妓院里逛，看见哪个妓女顺眼，就花个三五千接出去。过个十天半日，妓女不愿意跟他出来再混，他也毫不留难。这一来，他的名气就在妓院里创开了。

黄稼寿还把王爷少爷们邀到他家里玩。吃酒、打牌，还有

花彩贞和他的其他姨太太们陪着。而且又不用这些王爷少爷们花一文钱，真是再便宜没有的事了。日久天长，王爷少爷们和他的姨太太们发生关系。拈二和花彩贞搞得火热，弄得人所共知。黄稼寿也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装不知道。

原来自从民国成立以后，这般王爷少爷们只好靠变卖祖产过活。他们祖先遗留下来有的是古董字画、珍珠宝石，什么均窑、官窑……，在王公府上真是稀松平常。自从他们认识黄稼寿以后，凡是这些买卖古董的事都托黄代办。这些王爷少爷们本不识货，往往一件价值连城的古董，三百二百地卖给黄，黄一转手卖给外国人，就是几十万、几百万。有时黄还拿些假古董代替王爷少爷们的真货色，真是说不出多少倍利钱。黄稼寿等于开了个变相的妓院，实际上却是一个没挂招牌的古董店。因此短短期间就大发其财，而中国的国宝却在无形中都流到外国去了。同黄来往的日本人最多，大概日本收藏的中国古董，有不少是从黄手中买去的。

那时不但王爷少爷们变卖度日，最后连溥仪也常常把宫里的古物拿出来卖。邓君翔和溥仪很熟，溥仪常把东西押在汇丰银行，也常常把东西卖给邓。记得邓君翔曾给我看过一对小金丝灯笼，非常玲珑精致。他说这是一对宝贝，清宫里头来的。邓君翔说，他还买过一座宝塔，光是上面的珠翠，拆下来就摆满了几个大盘子。

我姐姐 13 岁就上了捐，是她自愿的，我母亲最初不赞成。张弧给她起个名字，叫香妃。交通银行的胡笔江带头先捧三天。因为他和我母亲也是多年的关系。在清末，胡笔江开始跟在时素卿后面逛窑子，每逢年节开销，我母亲总是把时的账单开好，交到胡笔江手里，时素卿的开销照例由胡代付。说穿了，

当时他是时素卿的一个挟皮包的，慢慢才在银行界露了头角。由于有银行界捧场，我姐姐在庆余堂真可以说是“开门红”了。

四、“黄金”时代

李鸿章的儿子李四少爷来逛。她信手把李四少爷的马褂放在床上，李感到非常高兴，一伸手就掏出一张 50 两的银票赏给我母亲。我母亲初从乡下出来，第一次看见 50 两银票，真以为自己是作梦。

我姐姐上捐的那一年，是 1917 年。正是北京城里南方妓院最兴旺的时代，也是北洋政府在政治上比较稳定的时代。虽然南北没有统一，但是北洋政府在段祺瑞的统治之下，总算支配着大半个中国。由于段祺瑞大借外债，建立军队，财政上还可以敷衍支持。政府的大官、银行的买办固然大发其财，就是一般小官每月也有薪水可拿。因此南城的繁华区从前门外一直发展到香厂、先农坛一带。邻近八大胡同的香厂新建成了几条马路，家家是洋式门面的楼房，俨然有点上海、天津租界的派头。东方饭店成了最时髦的新式旅馆，新丰楼、六味斋……，一家挨着一家的大饭馆子。街上还有小吃素人鞋店、马玉山饼干厂、美芳照相馆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等若干家从南方迁来的新式商店。在这里先后开设了两家上海式的游艺场院，一家是五层楼的新世界，一家是备有小型游园的城南游艺园，把上海大世

界那一套经营方式搬到北京来。在新世界旁边，还建立了几栋上海式的弄堂，供人开设南方妓院，这就是东、西大森里和大安里。大安里一般叫做一等半，次于一等的清吟小班，而大森里则和韩家潭、百顺胡同的南方妓院地位相等。于是在生意最兴隆的时候，北京城里的清吟小班竟发展到 72 家，每家平均以五个妓女计算，就有 400 人左右。比起民国元年、二年（1912、1913 年）来，这当然可以说是很大的发展了。

在南方妓女这样多，一个赛一个的时候，我姐姐能够“一炮打响”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姐姐本来长得漂亮，虽然只有 13 岁，但因身材不矮，也像个十五六的大姑娘了。我母亲也真会打扮她，给她梳上两个大圆头，头上戴的是两枝灿烂的珠花。那时已经不时兴穿裙子了，上身是窄小可身的绸子衣服，下面是肥腿的长裤子，配合衣服的颜色，镶着各种花边。手上还带着光彩耀目的钻石戒指，俨然有点贵族小姐的派头。房间的陈设直到三季的窗帘都是全堂新制，特地从洋行里面订购的头等货色。我姐姐虽然是个小孩子，不懂得什么，但却有一副好嗓子，唱几句谭派老生，倒也能博得外行称赞内行点头，都说“真有味！”每次见客、出条子有我母亲跟着代为应酬，就更能使客人满意高兴了。

但她头一年作生意就能这样好，还是靠着银行帮的力量。记得旧历年正月初一那一天，邓君翔在我姐姐房里请客，不但所请的 33 位客人一个不落，还额外多出了三个人，都是听说邓三爷在此请客赶来捧场的。汽车摆满了韩家潭，银行界里的头头脑脑没有一个不来的。如中国银行的张嘉璈、冯耿光、吴震修，交通银行的曹汝霖、钱新之、时素卿、胡笔江，盐业银行的岳乾斋，金城银行的周作民，中南银行的王孟钟，大陆银行的谈荔荪；还有华比、中法等等几家外国银行的买办。按照妓

院的习惯，每逢过年妓女自己的客人来到都要摆上果盘，客人照例要付出一笔赏钱。这一天，香妃屋里一共摆了八份果盘，这就说明在 36 位主客中，有 8 个银行老板是招呼香妃的客人。

我父亲、母亲那天自然拿出十二分精神来应酬这些阔人们。酒席做得格外精致自然不消说了，酒席上面所用家什器皿都与与众不同。瓷器当然是江西细瓷了，盛 12 道大菜的是汉口订制的锡器，上面有盖子，上下镶着狮子滚绣球等各种花纹。羹匙、布碟都是银的，筷子却是金的，一双筷子一两重。正赶上大年初一，庆余堂照例悬灯结彩，房间里又点着一尺多长的龙凤蜡烛，陈列着各色各样的年糕、糖果、供品。连座上摆的巧克力糖也是新从正昌西餐馆买来的，上面也包着灿烂的金纸。

这年，徐树铮也对我姐姐大加赏识，牌酒不断。于是北京城里的大官都赶着来巴结。潘复当时就曾经送给我姐姐一副石镯子。他看见乌利文洋行有新到金刚钻方形女金手表，据说是瑞士最新的式样，也忙着买了一个来送给她。他的用意很明显，自然是希望我姐姐能够口头上做作人情，替他在徐树铮面前说几句好话。

不过，认识了徐树铮也有些不方便处。徐这个人心眼小，醋劲很重，别的客人便不敢再招呼我姐姐了。例如，梁士诒原是个有名的财神，他本是我姐姐的客人，但自徐来走动以后，梁士诒便不敢再来。

叶恭绰也是常在妓院走走的人。他曾认识一个妓女名叫陈兰香，是个南方妓女却在北班子里作生意。叶很喜欢她，把她娶了回去。陈生过一个女儿，不久就死了。叶恭绰伤心得不得了，听说曾经起誓要为陈兰香吃一辈子素，因此，妓院里都说

叶二爷是个有情的人。后来叶又娶了一个妓女，名叫惜云^①。不知怎么，徐树铮专喜欢拿叶开心。当他请客时往往预先关照在座的妓女们说：“一会儿玉虎儿（叶字誉虎，所以徐称他玉虎儿）来了，你们都逗他，拿他开开心！”他既这样说，谁敢不遵？于是叶一进门，从我姐姐起就和他大开玩笑。叶恭绰把一张脸窘得通红，徐还俏皮他说：“你们瞧玉虎，简直像个大姑娘！”

徐树铮常在妓院摆酒，也常在他自己公馆里请客，请客免不了叫条子，叫条子少不了要叫我姐姐。有一次我姐姐很晚才回来，向母亲哭诉。原来她被徐树铮用计强奸了。第二天他给我母亲 1000 块钱。

徐树铮后来又用几千块，在庆余堂娶了蘋乡，还在春艳院娶了个小金刚钻，是同一天用花汽车接去的。徐树铮同时娶了两个姨太太，虽然都是年纪轻轻的，但徐却对她们很冷淡，家里一切仍旧听苏芸仙的。当时徐树铮正做西北边防督办，要到外蒙古去。有人就说：“徐树铮要用美人计，买两个美人，准备带到蒙古去，送给蒙古王爷。”

徐树铮所以能够在妓院里面抖这样的威风，主要是因为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一手。人家都叫他小扇子，专能翻云覆雨。因为段祺瑞和冯国璋不和，他就出主意开新国会重选总统，捧出徐世昌，把冯国璋打倒了。为了选举国会，选举总统，他在西城安福胡同成立了一个安福俱乐部。徐树铮以下，王揖唐、李思浩、曾毓隽、姚家兄弟……都是这里的头面人物，因此，一般都称他们作安福系。而这帮人都是妓院里面熟客，一向手笔最阔。所以我母亲常说安福

^① 惜云在日本侵略中国是时才和叶脱离。